

做一个有故事、会讲故事的班主任

□朱永春

多年前,我有幸参加一个出国考察的研修班。有一堂课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还留下一张我靠墙专注听课的照片。

那堂课的主题是国际视野下学生的核心素养,但讲课的老教授突然话锋一转,让我们这群中国教师说说教师的核心素养应该是什么。

大家对学生的核心素养似乎都能谈出个子丑寅卯来,但论及教师自身的核心素养,显然没有充分思考,但还是有人给出了诸如“师德”“创新”“爱心”之类的答案。

我觉得这些答案太过笼统抽象,很想举手给出自己的答案——“会讲故事”。

长期的育人实践,让我慢慢养成了爱讲故事的习惯,讲故事也成为我当好班主任的绝招之一。但要会把讲故事当作答案,在国外的课堂上、在美国教授与中国同行的目光下亮出来,我感到有点底气不足。最终,我的手还是没敢举起来。

直到有一天,我读《人类简史》,看到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一个说法: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编故事。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的育人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持,让我感到特别欣慰。

后来,我知道了尤瓦尔·赫拉利是一个以色列人,而以色列有一则古老的寓言:讲的是“事实”曾与“故事”经过一个村庄,村民一见“事实”就对它吐口水,破口大骂,用棍棒驱赶;对“故事”却热烈欢

迎,拿出好吃好喝的热情招待。“事实”把自己的遭遇哭诉给“故事”听,“故事”就把自己的漂亮外衣脱下来,借给他的朋友,让他再去造访该村。这回,穿着漂亮外衣的“事实”也得到村民的一致喜爱。

我曾带过一个比较活泼的班级。但不久任课教师便有了怨言,说班上的学生活跃过了头,上课时总有人随意插嘴,教师讲课或学生回答问题时经常被别人打断,课堂效率深受影响。

那天备课时,我特意把我的那张照片从电脑里找出来,放在数学课件的第一页。

上课了,学生们惊讶地看着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外国老教授在讲课,下面坐着一群中国学员在认真听讲,但有一个人例外,他背靠墙壁,站着听课。

照片上这个站在墙边的人,正是他们敬爱的班主任朱老师。学生们很吃惊,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你们叽里呱啦在说啥呀?”我佯装好奇。

“这该不会就是您上次去美国考察学习的照片吧?朱老师搞双标啊:对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当了学生却不遵守课堂纪律,被靠墙罚站。朱老师把脸丢到国外了。哈哈!”学生们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摇头。

我坦然承认,这张照片就是我在美国上课时领队随意拍摄的。“谁搞双标啦?别瞎扣帽子哦。”我装作很生气。

“大家都知道,朱老师的英语是所有

数学教师中最棒的。在美国学习时,大学教授的课我都能直接听懂,根本不需要翻译。”

我娓娓道来,学生们安静地倾听。

“其实,我们研修班是配备翻译人员的,但有一个学员太好学,性子又急,不仅总想第一时间知道教授在讲什么,而且总喜欢与我讨论,于是他特爱坐在我的身边。虽然我们一直压低声音说话,但我毕竟学了多年的外语,有较强的跨文化意识,总感觉在美国的课堂上这样窃窃私语很不礼貌。”

我告诉学生,美国课堂有的方面很自由,比如学生不一定要正襟危坐,只要不影响他人,可以站着、趴着、席地而坐,甚至躺地板上听讲,而且还可以随时打断教师的讲话,发表自己的观点。

但人家的课堂为何没有乱哄哄的景象?这是因为,自由并非随心所欲,美国的学生想发言要先举手示意,待教师同意方能开口。课堂上不经教师同意就说话是非常无礼的行为,是缺乏教养的表现。

我的那个同桌没学过外语,没有这方面的文化意识,国内的听课习惯一时又改不过来。

同时,我又怕老教授误解,以为我们不尊重他,或者中国学员听讲习惯不好。进退两难之际,我向同桌谎称:自己腰椎不好,不能久坐。我就这样借故离开座位,靠着墙壁听课。

“其实,我是多么希望像你们一样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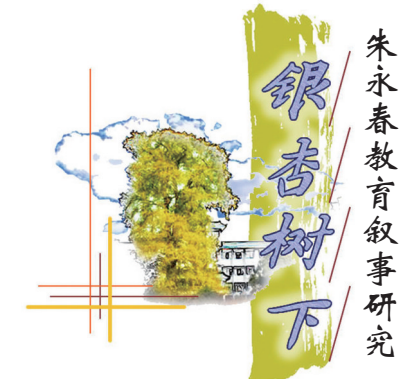
服地坐着听课啊,站一节课到底还是腰酸腿疼的。”故事的结尾,我又将话题拉回当下的课堂。

学生们专注地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开始上数学课。

那堂课学生仍很活跃,但课堂氛围有点不一样,再也没有出现七嘴八舌吵闹闹的景象。后来,其他教师反映,他们的课堂也有改观,学生发言前都会先举手。

有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回到了那个美国教授探讨教师核心素养的课上。在其他学员给出各种答案后,我毫不犹豫地举手。我的答案与众不同,但无人嘲笑。

(作者为桐乡市第三中学教师、浙江省德育特级教师、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浙江省“春蚕奖”获得者)



□安吉县孝丰小学 傅金平

教书的头几年,办公室里一位备受尊敬的老教师曾这样告诫我:“离学生远一点,保持神秘感,他们才会怕你,才镇得住课堂。”

那时的我,谨遵教诲,刻意与学生保持着距离:课间十分钟,埋头批改作业;上下班路上,行色匆匆;即便在热闹的运动会上,也多背着手巡视,像一个不苟言笑的监工……我以为,这就是所谓的“师道尊严”。

光阴荏苒,一次偶然的对话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一天放学,我在一家蛋糕店门口等公交车。凯凯背着书包跑过来,仰起头,好奇地问我:“老师,您是不是不住在孝丰呀?我看见您每天放学都在这儿等去遛铺的车。”

我心头一震。这个“小机灵鬼”,不仅不害羞,没像其他学生一样跑开,还在观察我,而且观察得如此细致。

我笑着回答:“是呀,你呢,是不是常来这里买好吃的?”

就这一问,打开了凯凯的话匣子。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这家面包店里哪款面包最香……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上学路上那短短的几分钟,竟是如此珍贵的交流时刻。

陪学生从校门口走到接送点,一路上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新鲜事、接下去的打算,最能直接地感受到他们的情绪:是开心得不得了,还是有点儿闷闷不乐。

我也开始珍惜课间十分钟,虽然少了我们当年跳皮筋、扔沙包的热闹场面,但学生们总能找到自己的乐趣,有的围在一起讨论最新的动画片,有的交换着漫画卡牌,有的则安静地趴在窗边看云……我会走过去,不是以监督者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好奇的大朋友。

“这张卡牌很厉害吗?”“这部动画片更新到哪一集了?”这样简单的问话,常常能引来他们热烈的回应。在消除了戒心的闲聊中,我听到他们对作业量的真实吐槽,也摸清了他们最近在学习上的困惑。

而研学活动和运动会这样的大场合,更是师生情感升华的绝佳时机。

没有了教室和讲台的界限,师生关系变得更加平等和自然。

我为学生在运动会上的拼搏呐喊助威,在他们休息时递上一瓶水、开一句玩笑,和他们一起研究植物标本……我看到的不再是“学生”,而是一个个鲜活、完整、充满个性的生命。

他们会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角,兴奋地指给我看他们的发现;他们会在失败后红着眼圈来到我身边寻求安慰……在轻松的聊天中,心灵的隔阂悄然冰释。

回过头来看,那位老教师的教诲深深植根于他所处的时代,那种带有距离感的教育方式确实曾在一定程度上对稳定秩序起过作用。

时至今日,我们也老了,更应持续学习,主动拥抱变化,甚至要有勇气放下某些曾经奏效的经验和法宝,选择更柔软、更贴近的方式:倾听学生的声音,用真诚的聊天走近学生,让教育在对话中自然发生。

每一次看似随意的闲聊,都是一次温暖的连接,都是心与心的碰撞,让我能真正听见学生思想抽穗、情感开花的声音。

那个黄昏,那一声“老师,您是不是不住在孝丰”的寒暄,至今依然是我教育生涯中最动人的回响之一。

我不要学生怕我



醉秋光

近日,在杭州外国语学校第60届田径运动会入场式上,初一(1)班学生谷玖诺的轻盈舞姿显得特别耀眼。作为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艺术团舞蹈团成员,她是入场式舞蹈的编舞和领舞。活动现场,中国舞舒展的舞姿表达了青少年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以及蓬勃向上、拥抱未来的精气神。

(本报通讯员 倪江 摄)

父亲的戒尺



□金华市婺城区罗埠镇中心小学 潘丽仙

父亲是个退休的老教师,身材瘦削,眼睛炯炯有神。但他的背有些微驼,走路时总是微微前倾,仿佛随时准备俯身拾起地上的一片纸屑。

我后来才明白,他这姿态,是一生都在俯身教书育人的习惯使然。

我家祖辈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爷爷奶奶常对我们说,那时候村里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按手印时总被人算计,吃了不少亏。到爷爷这一辈,家里发了狠心,无论如何也要供出一个读书人来。

父亲从小聪慧,五岁时就能背《三字经》,七岁入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村里有个老规矩:每年腊八节都要在六德堂举行隆重的仪式,由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者给学业有成的学生颁发奖励:两对馒头、两斤挂面、两斤白糖和两尺红布。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份奖励足以让全村人羡慕。父亲好几次获得这份殊荣,爷爷奶奶每每说起时,浑浊的眼睛里都会泛起骄傲的泪光。

父亲考取兰溪师范学院那年,村里放起了鞭炮。爷爷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庆贺,奶奶用那两尺红布给父亲缝了一件新褂子。

父亲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老家时,全村人都来送行。他走得很慢,不时回头望望站在村口抹眼泪的爷爷奶奶,又望望那些一辈子没走出过村子的乡亲们。

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刻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当个好教师,让老家更多的学生能读书识字。

父亲教书极严,他有一把竹制的戒尺,油光发亮。奇怪的是,那些手心被戒尺“触碰”过的学生长大后反而最感激我的父亲。小方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如今他已是县城重点中学的副校长,逢年过节总来看望父亲。

一天晚上,那位领导的老婆在我家门前倒了一堆垃圾。我的母亲气得直哭,父亲却一声不吭地拿起扫帚,在寒冷的月光下一点一点将垃圾清扫干净。

“做人要坐得端行得正。”这是父亲的口头禅。

我女儿上小学时,我想托关系让她进重点学校,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你自己就是教师,带头破坏规矩,让其他教师怎么教书?”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皱纹像刀刻一样根根凸起。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生气的样子,只得作罢。后来女儿在普通学校成绩优

异,父亲露出难得的笑容,常常奖励她书和文具。

2002年,我觉得在乡村学校埋没了自己,想调动工作。

父亲躺在藤椅里,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听完我的话后突然坐直身子:“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他的声音不大,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我看见他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像几条扭曲的蚯蚓。那把蒲扇被他攥得咯吱作响,扇面上的竹骨都露了出来。

最终我没敢再提调动的事,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在原校教书。2002年,我入选婺城区首届百名优秀班主任并获评金华市优秀班主任称号,应验了父亲的那句箴言。

父亲对别人严格,对自己更狠。他有个用了30年的搪瓷杯,杯身上的红漆早已斑驳脱落,杯口缺了个小口。母亲几次要扔,他都拦着不让。他常说:“能用就行,何必浪费。”

2008年汶川地震,他正在住院,听说区退休教师协会组织捐款,硬是拔掉输液管,赶去捐了自己大半个月的退休金。护士追出来时,他已经跳上公交车,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后摆还夹在车门外面,随着车子一晃一晃的。

我们离开老家很多年了,平时很少回去,但听说老家修桥修路,父亲总是带头捐钱。

晚上,我看见他坐在书桌前,把钱一张张抚平叠好。他的手指关节粗大,动作却很轻柔,像是在对待什么珍宝。台灯的光线照在他的白发上,像落了一层雪。

我突然发现,父亲真的老了。

小时候,我们三姐妹每天早晨都要站在院子里背诵《三字经》,晨露打湿了布鞋,肚子饿得咕咕叫,却不敢有半点懈怠。

前几年的一个春节,我们三姐妹带着孩子去看父亲,父亲让小外孙们背《三字经》,小外孙们背得结结巴巴。

父亲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我看见那把戒尺就挂在墙上。

父亲今年80多岁了,仍然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清晨,他都要把戒尺取下来擦拭一遍,然后坐在门前的藤椅上读书。

阳光透过梧桐树的缝隙,投下斑驳的影子,戒尺就放在他手边的小茶几上,乌黑发亮,像一段凝固的时光。

前些日子搬家时,我们跟父亲一起整理他用过的书箱,发现一摞发黄的信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那是学生写给他的信,他们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当上了医生,更多的成了像他一样的乡村教师。最后一封是小方老师写的:“老师,您当年那顿戒尺打醒了我这个差点误入歧途的年轻人……”

我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滴在信纸上,晕开了一个小小圆点。

父亲从不说什么大道理,但他用一生的坚守为我们立起一根做人的标尺。这把无形的戒尺,比任何金属制的都要坚硬,它量得出人心的曲直,称得出品德的轻重。

如今我也是一名教师,站在讲台上,常常感觉父亲就站在我身后,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那些年轻的脸上。